

K835.1256
4

托尔斯泰晚年生活纪事

〔俄〕瓦·费·布尔加科夫著 陈伉译

垂暮之年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垂 暮 之 年
CHUI MU ZHI NIAN

——托尔斯泰晚年生活纪事

〔俄〕瓦·费·布尔加科夫 著

陈 伉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78千 插页: 4

1984年5月第一版 198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2,500册

统一书号: 10089·269 每册: 1.80元

绪 论

有关托尔斯泰的文学回忆录卷帙浩繁。作家的同时代人留下的每一页记载差不多都可以使我们对这位“十九世纪所有伟大人物中最复杂的人”^①的认识更加丰富。在这些浩瀚的著作中，托尔斯泰的秘书瓦·费·布尔加科夫的日记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布尔加科夫伴同托尔斯泰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充满令人痛苦的经历和紧张事变的一年。当多年来折磨作家的矛盾聚集到一个难以解开的纽结上的时候，终于导致了一场悲剧性的结局。这就无疑赋予了布尔加科夫的日记以特殊的意义，使其具有了自己的特点和价值。托尔斯泰本人在他的日记中对自己、对他的探索、思考和痛苦谈得很多，但那只是托尔斯泰为自己写的，而且他还特别强调了“只为自己一个人”这一点，所以在他的日记中就自然丧失了叙述的完整性，忽略了对他外部生活的注意，——这是只有旁观者鲜明生动的描述才能做到的。索菲亚·安德列耶芙娜·托尔斯泰娅对这一年的记述之详细是众所周知的，但是由于她的病态，她所注意的仅只是与个人命运以及被她的病痛意识所左右的猜疑妒忌有直接关系的那些事情。关于作家这一时期的生活，著名音乐家亚·鲍·戈尔登威泽尔教授的著作《在托尔

①《高尔基文集》14卷307页，国家文学出版社，1951年。

斯泰身边》一书保存了大量资料。然而与布尔加科夫不同，戈尔登威泽尔仅仅拜访过雅斯纳雅·波良纳，在此作过客，因此他只能在他的书中尽其所知地做一些描述。在国立列·尼·托尔斯泰展览馆手稿部收藏着托尔斯泰的朋友、信徒和医生屠申·玛柯维茨基的未出版的笔记，他曾速记了从托尔斯泰那儿听到的一切；还收藏着托尔斯泰的女儿亚历山得拉·列沃芙娜的女友、打字员瓦·米·费奥克利托娃的日记，——整个1910年她都是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度过的。所有这一切没有出版或准备出版的资料，对于读者和专家们都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只有从各种不同观点的对比中，从对许多事实的比较中，才能更真切地做到对这位伟大作家的个性及其生活悲剧的真正理解。

现在发表的这部日记的作者瓦·费·布尔加科夫，在他替代被沙皇政府流放的托尔斯泰的秘书尼·尼·古谢夫的位置时，还很年青。由于处在托尔斯泰的有力影响下，由于折服于托尔斯泰的声望，布尔加科夫力求最完整、最准确地把他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一切都写进他的日记里。日记忠实地记述了伟大作家的思想见解，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环境气氛和日常生活；提到了许多来访者、客人和友人。布尔加科夫的记载使我们站在五十年之后的今天还能清楚地想象到作家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理解他的精神状态，探讨他许多作品的酝酿过程，并且同他一起经历他生命中这段最痛苦的时刻。

阅读布尔加科夫的日记可以十分具体地感觉到托尔斯泰的“伟大人格”，——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尽管到了晚年，工作紧张繁重，内心充满痛苦，但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依然没有枯竭的形象。布尔加科夫证明：托尔斯泰就是在他的垂暮之年，仍然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把许多精力、时间、注意力和每日不辍的劳作都献给了他的文集《每日必读》和《生活的道路》。他不停地思索着材料的选择、分类的原则。他数十遍地改写

阐述他的人生观基础的《生活的道路》的序言。在这临终前的一年里，也象在以往的岁月中那样，作家体验到了真正的创作激情，一口气勾勒出短篇小说《无意之间》的草稿，一天之内创作了体现托尔斯泰高度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霍登卡》。政论文章、宗教哲学著作汇编、剧本、风俗剧、中篇小说，这就是托尔斯泰在他的八十诞辰纪念时的创作范围。

布尔加科夫的日记帮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智慧和性格的多面性和广泛性。我们将在他的工作和休息中，书桌和棋盘旁，成人和儿童中，平民和贵族客人中看到他。在逐日记述雅斯纳雅·波良纳的生活时，布尔加科夫引用了大量令人信服的材料，证明托尔斯泰和人民有着怎样的联系，证明他以不倦的关怀和同情密切注视着国家复杂而苦难的生活怎样闯进偏僻的雅斯纳雅·波良纳。这一切使布尔加科夫的日记成了研究托尔斯泰晚期生活时有益而必要的珍贵资料来源。

布尔加科夫的日记于1911年首次付印时的标题是《在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作家逝世后不久，日记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俄国首都的所有报刊几乎都对这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18年和1920年，布尔加科夫的日记两次再版。从再版的日记中仍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者的“托尔斯泰主义”，他对伟大艺术家世界观中软弱、反动一面的迷恋，对导师、宗教鼓吹者托尔斯泰的崇敬。作为托尔斯泰忠实虔诚的弟子，作为用全部余暇来撰写阐述托尔斯泰宗教观的《基督教伦理学》一书的布尔加科夫，本人在日记中占了很大篇幅。在再版日记中，还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对此，作者自己也已经指出来了。在第三版序言中，布尔加科夫承认由于日记发表的时候，所有与作家晚期生活的悲剧性事件有关的人差不多都还活着，因此他认为对许多事情避而不谈是必要的。“涉及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生活和家庭的事情，”作

者在序言中说，“过早地披露可能要引起某些参与者的难禁的痛苦，触及他们尚未愈合的伤疤，——正象第一版的读者所知道的那样，所以我当时有意识地克制自己，没有公开这些情况。纵然七年前不能说的许多事，诸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出走的经过，遗嘱的签订，关于手稿的争吵，出走时的情景，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等等，今天已经不但不再是俄罗斯，而且已经不再是全世界出版物的秘密了，然而我现在仍然不认为有责任宣扬别人家庭生活的种种隐私。自然，在不违背现在还健在的人们所提出的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在初版时也不得不遵从的委婉要求的前提下，这些事件和情况将会被尽可能地予以叙述。读者一定会理解那些迫不得已的删节和避讳，也不会怪罪这样做的动机”^①。这些被删减的部分，只是到了1924年，住在布拉格的布尔加科夫对他的日记作了大量的补充，出版了《在异乡》（第四册）之后，才得以公开。这套书于1828年在莫斯科以单行本形式出版，题名为《列夫·托尔斯泰的悲剧》。这次出版本书时，在日记正文中把许多新的补充加了进来，做了某些删节和润色，作者删去与托尔斯泰没有直接关系的地方和过多描写作者本人心理活动及其“托尔斯泰主义”的段落。但是作为托尔斯泰的“学生”、追随者所写的一部回忆录所固有的那些缺陷，在日记中还是有的，这就是既有对伟大艺术家思想之宏廓的欣赏和关注，也同样有对这一思想之软弱、迷惘和错误的迷恋。

总的来说，读者手中的这本日记对托尔斯泰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还是作了生动、真实的叙述，对于彻底弄清作家的社会立场、美学思想以及那出导致他离开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悲剧，还是提供了许多珍贵而可信的资料。

^①瓦·布尔加科夫：《列夫·托尔斯泰晚年生活纪事》，第111页，“大家族”出版社，莫斯科，1920年。

和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托尔斯泰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和人民的命运分开。为千百万俄国农民悲惨可怕的命运而痛苦，对怎样帮助他们脱离受贫困、受奴役的境地而不停地忧虑，——作家的整个精神追求都由此而来。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托尔斯泰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立场有多么复杂矛盾，但是贯串他自觉的一生的“只有一个主导思想”的原因之所在。这个思想永远主宰着他，不管他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安静地工作，还是同贵旅客人们谈话的时候；是在雅斯纳雅·波良纳郊外散步，还是在人群中倾听人们议论的时候；就是在晚年，托尔斯泰仍旧那样全神贯注地思索着这个恼人的问题，——这个思想在青春时代就潜入了他的脑海，迫使他离开大学回到自己的庄园，度过了给他带来那么多失望的“一个地主的早晨”。

这个思想，就是对俄国当时社会制度的极端不合理的思索。在这种制度下，一小撮寄生虫占有全部土地，过着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的生活，而无数农民却在饥饿和赤贫的枷锁下，挣扎在一小块土地上，同时还得不堪忍受的劳动来喂养那些奴役、压迫他们的人。托尔斯泰在他发表的论文、部分书信和私人日记中，向这一“极大的罪恶”提出了抗议。这个思想以各种方式渗透到了他的一切艺术作品中。在布尔加科夫所描述的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这个思想完全控制了他，给他带来了真正的痛苦。

弗·伊·列宁说过一句准确而深刻地反映托尔斯泰创作本质和人格本质的话：“在这位伯爵之前的文学中还从未有过真正的农民”^①。从布尔加科夫的日记对托尔斯泰日常生活的描写中也

^①《高尔基文集》17卷39页，国家文学出版社，1952年。

可以看到，虽然托尔斯泰是属于贵族特权阶层的人，但是就其喜好、观点和对所有事件的理解来看，所反映出来的却是俄国农民的观点。他注视着世界，注视着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以农民的名义谴责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在他的身上同时寄寓着农民的力量和怯懦，农民的反抗、进取的伟大精神和温良恭让的狭隘的宗法制思想。

托尔斯泰的新任秘书在雅斯纳雅·波良纳总共没住几天，就已经感觉到了把托尔斯泰与家庭其他成员分隔开来的那个界线，注意到了他们之间争论的主题和他与周围所有人的深刻分歧。布尔加科夫写道：“一坐下来就开始了活跃的谈话：爱国主义啦，外国对俄国的优势啦，最后是关于土地啦，地主和农民啦……我发现，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这所白色住宅的大餐厅里的谈话，总要归结到这个题目上来。”可是如果这所住宅的主人不在场，这个圈子里一旦有谁想到并提起那些无权坐在这里说出自己想法的人们的贫穷来，谈话就自然而然变成了类似当时贵族庄园里流行的那类海阔天空的闲聊。“苏哈金、他的妻子和谢尔盖英科指出农民们对地主和所有老爷们的反抗极其凶狠。”托尔斯泰的儿子安德列·列沃维奇断言：“俄罗斯农夫都是胆小鬼。”他说他亲眼看见“五个龙骑兵挨个儿鞭打有四百户人家的一个农庄里的人”。

“农民都是酒鬼，”索菲亚·安德列耶芙娜说，“他们受穷完全不是由于土地少。”然而一旦托尔斯泰走进雅斯纳雅·波良纳大厅，一个真诚勇敢的声音就会响起来，——这是摆脱了他周围的偏见包围的那个人的声音，是亲眼看到了穷得毫无保障、惨遭掠夺、备受愚弄的活生生的农民形象的那个人的声音。他用“平静而坚定的声调”说道：“如果农民有了土地，那就不会有摆在这儿的这些荒唐可笑的花盆……，不会有……这些每月只付给仆人十卢布工资的愚蠢的人们了。”——这就是隐藏在他心中的那个伟大而深刻的思想。这种思想意味着，土地一旦回到土地耕作者

的手中，地主阶级随同它的寄生生活，毫无意义而又空虚无聊的豪奢就不复存在了。

布尔加科夫的日记生动地反映出托尔斯泰是多么迫切地要求与农民保持经常不断的交往。他常常走到他们中间，同他们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吸取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然后他得出一个坚定的信念：土地不应该是哪个人的私有财产，而应当属于全体人民，应当把面包和自由交给人民。在和布尔加科夫的一次关于“农民生活令人发指的贫穷和人民的狂怒”的谈话中，托尔斯泰直接援引了他从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个农民口中听来的话作为论据，他说：“昨天我又碰见了那个农夫，和他谈到早先就谈过的那个问题。他渴望有土地，靠着土地他就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他们根本不想给地主干活，因为一切都不是他们自己的。因此，他们才干得很少，才酗酒。”

托尔斯泰久久地紧张地思索着怎样满足俄国农民的 这个要求，思索着怎样废除现存的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制，怎样把土地转交给人民使用。

托尔斯泰在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理论中找到了不通过革命和农业骚乱而实现土地国有化的道路。他追随乔治，断言只要颁布“统一的土地税”法令，就一定会使土地逐渐变成农民的“财产”；那时，土地奴役制、“富人对穷人的统治”就会消失。读者在布尔加科夫的日记中将会看到，托尔斯泰不单只是完全赞同乔治的观点，他还把乔治当作反对农奴制的不倦的战士。在他的眼里，乔治还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彻底、最现实的纲领的制定者。

托尔斯泰所坚持的宗法制农民的观点形成了他的世界观既有力又软弱的两面性。在这种世界观中，真正的民主主义思想与幼稚的乌托邦幻想合而为一。在捍卫俄国农民最迫切的需求的同时，托尔斯泰没有意识到，他如此卖力地宣传的亨利·乔治实际

上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而他的纲领只不过是“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实际上是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巩固资本家的统治”。^①但是，同样是这种农民的观点，决定了托尔斯泰对沙皇政府的土地政策，对臭名昭著的斯托雷平改革的坚决否定。根据布尔加科夫的日记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对号召改变俄国农村的整个发展方向的1906年11月9日的土地法很有意见。经历了1905年革命的尼古拉二世的政府，想用这个形式上允许所有农民有权自由脱离村社的彻底反民主主义的法令，企图在农村中建立巩固的富农阶层，以避免新的革命动荡。“斯托雷平政府打算怎样改造古老的村社制呢？”列宁写道，“它想加速农民的彻底破产，保存地主的土地，帮助一小撮富农超出农庄的界限，吞并尽可能多的村社的土地。”^②

托尔斯泰不能不看到，斯托雷平的改革是与千百万农民相敌对的，它带有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性质，是对私有者的支持。托尔斯泰敏锐而正确地看穿了斯托雷平的法令在民主词句背后隐藏着一个“狡猾的策略”：把一小撮农民变成富裕的土地私有者，为其余大多数农民丧失土地、一贫如洗寻找辩白的根据。1910年，托尔斯泰在他写的短篇小说《梦》的一个手稿异文中就曾严厉地谴责过斯托雷平的这套把戏：“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11月9日的法令是破坏古老的俄国村社制度的，是竭力摧毁人民意识中关于土地是全体人民共同所有这个信念的。这个法令只有一个目的：使人民彻底破产，用奇特的土地私有的诱惑力操纵人民。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使有一万俄亩的伯爵能对只有五俄亩的农夫说：你有五亩，我有一万亩，咱们都是私有者。”^③每当谈到沙皇政府新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中文版，384页。——译者

②《列宁全集》16卷330页。

③《托尔斯泰全集》38卷451页。

土地政策的时候，托尔斯泰所坚持的就是这种观点。他对阿·瓦·佩舍霍诺夫的著作《旧的和新的分地占有制》表示赞许，因为在这本书里他找到了自己观点的证据和证明斯托雷平改革对俄罗斯农村的毁灭性影响的材料。

托尔斯泰在梅赛斯克村契尔特科夫家作客期间，在和农民的一次谈话中，警告他们不要从村社中被分割出去。“这要吃许多苦头的，”他对他们说。在与自己的同宗奥巴林斯基邂逅相遇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谈起了11月9日法令。奥巴林斯基既然处在引人注目的地方长官的位置上，这话题就非常使人敏感。奥巴林斯基说，他做过多次调查，看到从农庄里分离出来的农民对他们的新处境很满意；他还说，不久前农民们曾向来访访问他的一个英国人、利物浦大学的教授表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打断了他的话：‘从物质利益方面来说，想必这对分割者是满好的。但是对所有的人却坏透了。被破坏的这个原则即土地的原则，是上帝也不能把它作为私有财产的……那个英国人喜欢这样做，可我是个俄国人，我不喜欢这一套。’”

布尔加科夫的日记中，有不少其他一些有说服力的展示托尔斯泰世界观有力方面的事实。在过去曾一度围绕在托尔斯泰身边的那些人们当中，可以看到国务委员会的成员们和国家杜马的代表们。米·亚·斯达霍维奇、瓦·亚·玛克拉科夫和米·谢·苏哈金把杜马的激烈的辩论，议会的残酷斗争带到了托尔斯泰家。他们讲述了暴风雨般的杜马会议的种种详情。但是托尔斯泰不赞成他们的意见，不相信杜马会给人民什么好处，对它抱有一种怀疑的嘲讽态度。布尔加科夫引述了一次能表现出托尔斯泰的洞察力和他在自己的亲人们中间的孤独感的有趣谈话：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该怎么对您说呢？普里什凯维奇的丑闻一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吧？’今天早晨米·谢·苏哈金遇见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时候说，‘霍麦柯夫辞职了！……’”

‘这难道就是严重的后果？’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

‘怎么不是！杜马的主席……’

‘还不是半斤八两？霍麦柯夫下台了，还会有一个叫托尔伯柯夫的上台。反正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托尔斯泰对杜马的态度表现了他的思想——一个总是维护被压迫者利益的人的思想——的政治敏感性。“我提起国家杜马来，”布尔加科夫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坚信不移地表示了这样的意见：杜马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它是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但是同时他承认，杜马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处境的不合理。”他看到由于建立公开的议会讲坛而产生的幻想是不会长久的，人民有可能再次证实：期待统治阶级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是枉然的。

尽管布尔加科夫的笔记部分地而不是系统地提供了托尔斯泰的论断和意见，但作家思想立场的矛盾性和不彻底性已经完全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托尔斯泰异常痛切地感到了现代社会制度的荒谬，把人分作不平等的两部分的怪诞：其中少数人占有全部财富，享受着科学和文明的全部成果，而大多数人注定过非人的生活，精神和肉体备受奴役。在托尔斯泰看来，整个世界都是荒唐可笑、颠倒反常的。关于现代社会不合理的思想越来越有力地控制着他。一大群七岁的女孩子从早到晚结着断了的线头，纺出的纱“被运到东方去牟取暴利”，而女孩子们却只得到少得可怜的报酬；同时，工厂的主人，“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先生”享有巨大的资本，这种现状难道是合乎道德的吗？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把成千上万法郎耗费在举办豪华而无聊的演出上，比如说上演《桑丹克列尔》，同时却有那么多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人流浪街头，这样的世界难道是合乎道德的吗？在土地和全部文化财富分配得极不平等、极不合理的情况下，怎么能谈得上合理的和平建设？还有，如果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老是要挑起内战的大屠杀，

要人们抛下和平劳动，去为和他们毫无意义的毁灭性的争斗而牺牲生命，还谈什么正常的社会秩序呢？根据布尔加科夫的日记可以看到，决心揭露现代社会秩序的“疯狂”和罪行的意图，是怎样逐渐控制了托尔斯泰的，他的《论疯狂》一文是怎样产生的。在这篇文章中，他证实，“人类的大多数处在一种也许是暂时的、但却是十足的疯狂状态中。”^①

但是托尔斯泰企图用幼稚的方法来揭露这个“病态”的疯狂世界。他是地主资产阶级制度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俄罗斯帝国整个秩序的愤怒而勇敢的揭露者；他同时又是革命斗争方法的死硬反对者，反动宗教哲学的创建者。在布尔加科夫的日记中，我们不只一次看到，与生活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幸消极调和，对革命者就象对犯了错误、误入歧途的人一样不予信任，是托尔斯泰一贯的宗教宣传。他用“勿以暴力抗恶”的学说来对抗革命运动，按照基督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培养新人，来对抗政治活动，用新的宗教观来对抗社会主义思想。布尔加科夫记载了托尔斯泰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想法：“真正的进步是很缓慢的，因为这取决于人们世界观的转变。这是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现在的一代人，首先是由老爷们——你跟他们在这儿吃饭都觉得于心有愧——和仇视这些老爷并想用暴力消灭他们的革命者组成的。必须等这一代人死绝了，由新的一代来代替他们。”

从托尔斯泰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老爷”，即统治阶级，还是“革命者”，即把通过革命斗争消灭现代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的人们，同样阻碍着在地球上实现他的基督教社会的理想。拯救他们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一些人走道德“复活”之路，另一些人走“意识革命”之路，不断地用基督教精神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完善；这样就会使私有者自愿放弃他们的权利和特权，剥削就会消

^①《托尔斯泰全集》38卷404页。

灭，国家机关和它的暴力压迫组织就将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武装冲突的危险也将消失。在托尔斯泰的观念里，社会改造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伦理道德问题。

1905年的革命风暴宣告了作为历史现象的“托尔斯泰主义”的破产，布尔加科夫向我们介绍的是破产之后的《复活》的作者。俄国仍旧处在革命的躁动之中，民众的不满和愤怒依然在增长，但是托尔斯泰并没有停止他那宗教学说的宣传。他十分紧张地全力投入文集《生活的道路》的编写工作之中，这从布尔加科夫的记述中也可以看出来。他赋予这一文集以很大的意义，因为这一文集之材料选择是为了证明革命的毫无意义和徒劳无益，是为了确立托尔斯泰宗教教义的正确合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下了凄楚的几行：“说出来是可怕的，不过事情一旦是这样，即：只是为了灵魂，为了上帝满怀欲望地活着，可是对许许多多问题仍旧狐疑不决，这也无可奈何。”^①托尔斯泰的思想矛盾扩大加深了，而且变得更加惹人注目、不可调和了。

托尔斯泰一方面号召禁欲主义似地弃绝尘世间的利益，否定革命的斗争方法，同时又不断注意倾听着人民大众日益响亮的的不满的呼声，欢迎人民所表现出的社会觉悟。当玛·亚·施米特告诉托尔斯泰，说她认识的一个农民抗议老爷们恣意挥霍农民的劳动成果——“用血汗挣来的”钱财时，托尔斯泰真心快意地说：

“大自然是多么神奇：冬天刚刚过去，春天就在这么两三天内到来了，——人民也是这样神奇。不久前，还没有一个象您所讲的说这种话的农夫，而现在所有的农民都在这样动脑子了。”

托尔斯泰高兴的是：俄罗斯在觉醒，农民们对奴役他们的人的仇恨越来越深，他们在开始要求坚决地变革现代社会制度的整个基础。

^①《托尔斯泰全集》58卷65页。

托尔斯泰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叛逆精神的战士，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已经完成了变革的影响下，这种叛逆精神更其增强了。无论是他的温情的说教，还是“勿以暴力抗恶”的学说，都不能摧毁和扑灭这一精神。托尔斯泰奋起揭露社会制度的不公正，社会关系的不合理，猛烈反对沙皇政府所犯下的残暴罪行。托尔斯泰收到他的在流放中的秘书尼·尼·古谢夫的一封信，信中说 he 读了柯罗连科的《司空见惯的现象》，“他感觉到，如果这种情况还要不断重复，就不值得再活下去。”托尔斯泰请求布尔加科夫给他写信，反对他的这种想法。“‘您写信告诉他，’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说，‘我不理解这些话，依我看，正好相反，如果你知道了这些可怕的事情，那就更要希望活下去，因为你将看到那个你为它能够活下来的东西是什么。’”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在这里听到了《我不能沉默》的作者的声音；他没有逃避生活，没有和邪恶妥协，而是与之进行了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对专制暴政和私有制社会的仇恨，在他身上有时比他的宗教说教、哲学思想表现得更强有力。这就是为什么托尔斯泰听到葡萄牙民主革命胜利的消息时会那么欢欣鼓舞的原因。“在现代世界各国，”他宣称，“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正象在葡萄牙一样。这是怎样的大火啊，火光越来越猛烈……是时候了；他们这些国王，统统要被打进地牢里……葡萄牙的这场大变革，不过是明显的第一步……再不会有奴颜婢膝，再不会有个人独裁了。”对在“政治斗争中前进”的伟大的法国革命，所表示出来的崇高敬意和伟大的激情，同样被布尔加科夫记录了下来。

在一个基本居民是由农民组成的国家里，农民政治觉悟的逐渐成熟，宗法制的局限性、软弱性和不彻底性的逐渐克服，这一革命发展过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均折射在托尔斯泰的世界观里，使民主主义的、先进的和落后反动的东西奇特地纠结交错在一起。布尔加科夫的日记证明，托尔斯泰在垂暮之年，也没有禁锢

抗议的、叛逆的精神；与他所确立的哲学思想相反，他的同情依然是在奋起反对君主制和地主阶级的劳动人民一边。

二

托尔斯泰和以往的所有现实主义艺术家一样，对艺术的理论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众所周知，这位誉满全球的长篇小说的作者，同样发表过大量关于美学问题的专著和批评俄国和外国许多作家的论文。在晚年，托尔斯泰尽管对文学越来越兴致衰退，对艺术轻率否定，看不到艺术创作的意义和益处，但他仍旧关注着文学艺术，思索着人民精神生活的发展变化。布尔加科夫的日记对此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材料。

托尔斯泰对个人创作、对作家这一职业的态度是复杂、矛盾的，虽然他把自己的一生整个地献给了这一事业。在他坦率拒绝从事艺术创作的时期，他却对促进现实生活和社会意识的更积极、更实际的其他艺术形式多次进行探索。天才的艺术家，整个世界文学中无与伦比的杰作的创造者，有时竟以一个艺术否定者的身份讲话。他因为意识到自己为之贡献了全部智慧和天才的那个事业毫无现实效益而感到真正的痛苦。对把艺术创作当作与人民毫不相干的上层社会老爷们的文化欣赏加以怀疑，是托尔斯泰世界观的一种特殊表现，它反映了农民自发形成的带有全部偏见和局限性的人生观。

但是托尔斯泰永远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艺术也永远是他热情关注、深感兴趣的对象，是他生活的必需。从布尔加科夫的日记中看得出，托尔斯泰是多么喜爱音乐，多么需要音乐。当戈尔登威泽尔演奏肖邦、贝多芬、李斯特、斯克里亚宾和其他音乐家的乐曲时，托尔斯泰在这样的家庭音乐会上得到了多大的快乐啊！在这种时候，他体会到了精神上的昂扬和激动，得到了真正

的休息，使自己摆脱了种种压抑和窒息。托尔斯泰在一次欣赏完戈尔德威泽尔(亦可译作戈利坚维伊泽尔，以下同。——译者)的演奏后，说过这样一句值得注意的话：“我要说，所有这种文明，都让它见鬼去吧！只是音乐叫人可惜。”被布尔加科夫记下的，而为戈尔德威泽尔的日记所证实的这句话是很出名的。

托尔斯泰看不起诗歌，他认为诗是贵族文化，是绝大多数俄国人民不能理解的、异己的东西。可是当他听了自己所喜欢的诗人普希金、丘特切夫和费特的诗之后，是多么兴奋啊。“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要是引用诗句或谈到诗歌，”布尔加科夫写道，“那总是普希金和丘特切夫，还有费特。”托尔斯泰密切注视着当代俄罗斯文学，阅读库普林与魏列萨耶夫以及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作品，了解贝雷依和巴尔蒙特，留心翻阅《俄罗斯财富》和《知识》文选。托尔斯泰，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俄罗斯文学中骄傲和光荣的俄国作家的代表，尽管他有许多论断是矛盾的，不彻底的，但他对发展和继承了伟大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仍然表现出始终不渝的钦佩和向往之情。“果戈理、陀思妥也夫斯基（无论这个人多么古怪）、普希金，都是我特别珍贵的作家。”布尔加科夫引述托尔斯泰的话说。

托尔斯泰焦急不安地观察着现代文学中颓废派的、反现实主义的思潮的加强，忧心如焚地注视着艺术水准的下降、思想意义的低落及崇高的道德激情的丧失。颓废、腐朽的诗遭到了他毁灭性的批判，这种诗被他称为“作家的鸦噪”。通过这种诗，他看到了当时社会状况与俄国专制社会制度之特征——“疯狂”。安德列·贝雷依的胡诌，巴尔蒙特和梅列茹柯夫斯基的诗歌的抽象象征主义的内容，阿尔采巴塞夫的色情散文，在托尔斯泰看来，都是这种“疯狂”的产物，都是寄生的统治阶级的低级趣味。

1910年，托尔斯泰先后会见了列奥尼德·安德列耶夫和弗·葛·柯罗连科。两次会晤布尔加科夫都做了详细描述，为了解托